

中国古代文学二十讲

◎ 何梅琴

叶爱欣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成化辛卯 物茂金蓮恩茂
過竹筵山房得香無歸
酌竹林深處談話聞香賦
素曲於時清靜恍惚作此
圖以誌清寧

南齊沈氏



中国古代文学二十讲

主 编 何梅琴 叶爱欣
副主编 马跃敏 罗浩刚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二十讲 / 何梅琴主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4 - 08290 - 6

I. 中… II. 何…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9408 号

中国古代文学二十讲

主 编 何梅琴 叶爱欣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平顶山市瑞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16.125 印张

字 数 39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290 - 6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这是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师集体编纂的一部学术性论著。

写作本书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对已经掌握文学史基本知识的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简单训练，引导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重要的文学现象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引发他们对文学研究的兴趣，同时作为参考资料，为其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性研究提供一个便捷的门径和平台。其二，《中国文学史》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课时间最长的一门课程，在毕业生所作的毕业论文中以古代文学为选题的不在少数，但是我们发现不少论文没有基本的学术家法，甚至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因此有必要开设一门课程告诉他们学术的基本规范以及学术的本质。其三，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一些学生询问超出现有教材深度的问题，这些学生对古典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即使中文系的学生也多数以古典文学为古董，偶尔鉴赏一下还可以，真正对其发生兴趣的很少。而我们以为此少数派最有可能成为以后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因此我们有责任接引这部分学生更快地踏上学术研究之路。为此，我们花费两年功夫编成了这本《中国古代文学二十讲》。

现代视野下的古代文学，应该具有宏通的思路和高远的学术追求，我们努力把握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以及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研究中保持了较强的人文关怀精神。除了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古典文学一度兴高采

烈,有的学者探讨文化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的探讨某种文化形式对文学的影响,还有的结合文化、历史、制度等文学外部因素探讨文学现象,而文体流派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史研究领域更是方兴未艾,汇集了各路精英,这些我们都尽量地给予关注和解读。

本书各讲的研究角度、方法虽各有特点,但都尽可能地介绍学术研究的前沿状况,用一定的篇幅来对选题研究进行概述性介绍,以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关于此类综述性内容的安排,我们较多考虑的是资料的介绍和梳理。现在不少学人提倡从资料中“走出来”,但“走出来”的前提是“走进去”,没有走进资料,又何谈“走出来”呢?所以,对基本材料的透彻理解,应该是学术的生命线。

在 21 世纪,每个民族都在努力建构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个性的思想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社会上备受冷落,似乎已被囿于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象牙塔中,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的。学术研究有大有小,本书的编纂若能为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即是我们的大幸。

本书特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所选专题的时间跨度自先秦至元明清,且在大跨度中突出重点。这样,既保证了学术的深度,又适应了不同学生不同兴趣爱好的实际情况。

第二,立足前沿,资料翔实。根据实际情况,多数专题都会用或长或短的篇幅对选题研究现状进行描述。对于引文多注明出处,力求清晰、准确。引文注释采用页下注,以减免学生的翻检之劳。

第三,力求创新,兼顾稳妥。在多数选题中都有作者对某一学术问题的独到体会。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观点新颖的同时,尽力使观点相对平正,以利于接受。

第四,视野开阔,方法多样。专题既有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又

有对文学思潮的探讨。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视角各异,历史学、文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各种方法在本书中都各有侧重地呈现出来。

第五,行文尽可能通俗和简洁。

本书主编:何梅琴、叶爱欣;副主编:马跃敏、罗浩刚;其他参编人员有:李爱红、常民强、陈富志、魏玉莲、岳上铎。本书的编写首先由主编制定出编写计划和编写大纲,然后由编委分工写出初稿。各讲分工如下:马跃敏(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第五讲),何梅琴(第四讲、第六讲、第八讲),常民强(第七讲、第九讲、第十三讲),罗浩刚(第十讲、第十一讲、第十四讲),陈富志(第十二讲),李爱红(第十五讲、第十九讲、第二十讲),魏玉莲(第十六讲),岳上铎(第十七讲),叶爱欣(第十八讲);几易其稿,最后由主编修改定稿。在编写过程中,袁桂娥和秦方奇两位教授提出了合理建议,陕西人民出版社使本书的出版得以实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学识和水平所限,也由于缺乏经验,本书的缺点、错误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多多指正。

编 者

2008年4月

目 录

第一讲 《诗经》的传统研究与现代视角	(1)
“诗”与“经”——从一个前提条件开始	(3)
现代《诗经》研究的阶段特征	(5)
新时期《诗经》研究的热点	(8)
《诗经》研究的趋向和视角	(10)
第二讲 《庄子》研究浅说	(22)
新时期《庄子》研究的特点	(23)
《庄子》形象与理想人格研究	(27)
《庄子》散文艺术研究	(30)
《庄子》美学研究	(36)
《庄子》影响研究	(42)
第三讲 《楚辞》研究回顾与瞻望	(46)
《楚辞》的编订及研究历程	(46)
《楚辞》现代研究热点回顾	(52)
海外《楚辞》学研究	(60)
《楚辞》研究趋向臆说	(63)
第四讲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史记》研究	(72)
《史记》研究回顾	(72)
二十世纪《史记》文学成就研究	(77)
《史记》高超的写人艺术	(86)
第五讲 《古诗十九首》现代研究及文学史意义	(101)
《古诗十九首》编订及研究概说	(101)

《古诗十九首》的现代研究路径	(104)
《古诗十九首》研究的热点问题	(107)
从文的自觉看《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	(117)
第六讲 陶渊明——关怀体贴的“隐逸诗人”	(126)
陶渊明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127)
陶渊明的三仕三隐	(135)
陶渊明诗文中的关怀体贴意识	(142)
第七讲 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	(152)
研究概述	(152)
荒野密林中的自然美景	(159)
青山绿水中的苦闷心灵	(162)
山水诗中的佛理意蕴	(166)
谢诗与陶诗的异同	(170)
第八讲 《世说新语》研究	(176)
《世说新语》的时代与编订	(176)
《世说新语》研究历程回顾	(180)
《世说新语》研究的热点问题	(184)
魏晋风度的文化意蕴	(200)
第九讲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204)
李白研究概述	(204)
诗酒浪漫里的人生	(211)
浪漫月光中的名篇	(214)
积极浪漫的精神风貌	(219)
生前与身后的浪漫传说	(220)
伟大浪漫的艺术风格	(223)
第十讲 诗史、诗圣——杜甫、杜诗誉称评议	(227)
诗史	(231)
诗圣	(238)

诗圣是杜甫最恰切的誉称	(246)
第十一讲 唐宋古文运动概述	(252)
唐代古文运动	(252)
北宋古文运动	(267)
第十二讲 苏轼研究	(277)
苏轼的思想	(278)
苏轼的词	(283)
苏轼的诗	(289)
苏轼的文与赋	(295)
第十三讲 爱国主义诗人陆游	(301)
陆游研究概述	(302)
陆游诗歌中的爱国主义	(308)
第十四讲 追求超凡的英雄文人辛弃疾	(324)
功勋追求——统帅	(326)
退隐追求——辛弃疾与陶渊明	(333)
创作追求——词坛霸主	(340)
第十五讲 婉约词的流变	(349)
婉约词的界定及研究概况	(349)
宋代以前的婉约词	(350)
宋代婉约词	(355)
南宋婉约词的发展脉络	(368)
第十六讲 关汉卿剧作人物论	(376)
关汉卿研究综述	(376)
多姿的女性形象	(381)
恶人群像	(388)
英雄形象	(393)
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及特征	(399)
第十七讲 《西厢记》人物论	(403)

《西厢记》人物研究简述	(403)
西厢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演变	(407)
崔莺莺形象分析	(413)
张生形象分析	(418)
红娘形象分析	(422)
老夫人形象分析	(426)
第十八讲 汤显祖与“临川四梦”研究	(431)
汤显祖思想研究	(431)
《牡丹亭》主题研究和比较研究	(438)
《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意义解析	(445)
《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研究	(451)
第十九讲 “四大奇书”的文化意义解析	(458)
研究概况及介入视角	(458)
《三国志演义》的伦理架构与批判立场	(460)
《水浒传》游侠精神与法外力量的政治收编与文化整合	(466)
《西游记》:人心的开启与整合	(469)
《金瓶梅》:以家喻国的世情与世相的真实描写	(476)
第二十讲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482)
《红楼梦》叙事艺术研究概况	(482)
生命化文章观中《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490)

第一讲 《诗经》的传统研究与现代视角

《诗经》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主要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五百年间的社会生活。春秋末期经过儒家学派的编订作为一门必读课程在门徒中传习，随之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孟子对《诗》的一系列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以意逆志”等，也奠定了后世儒家《诗经》批评的理论基础。

《诗》被奉为“经”，并改称《诗经》，是从西汉开始的。由于秦的“焚书”，汉初人们所研读的《诗》，是由口头吟诵而流传下来的。当时鲁（申培）、齐（轅固）、燕（韩婴）三家传诗，这三家传诗虽各有不同，但都以穿凿附会的方法，不同程度地掺杂着阴阳五行的思想，曲解诗意，来宣扬儒家的教义。后来的《毛诗》与《诂训传》，少了迷信的色彩，并将诗篇依次排列，使解诗有了一个简明的时间顺序。东汉时期，《毛诗》逐渐取代了“三家诗”的统治地位，这实际是汉代“古文学”对“今文学”斗争的结果。后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又为《毛诗诂训传》作《笺》，进一步提高了《毛诗》的声誉。所以毛、郑诗学为后人所宗，统称之为汉学。

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纯文学作品的发展与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诗经》研究也有了新的改观，出现了专门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的现象，如在《文心雕龙》中设《明诗》、《情采》、《比兴》等篇，对《诗经》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创作经验等均有精彩的论述。到唐初，孔颖达撰成一部集大成之作——《毛诗正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诗经》传、序、笺、疏的内容越来越显得陈旧，对

《诗经》进行新的解释,已成为现实社会的一种需要。宋代学者便以注重实证的思辨,对日渐僵化的汉学《诗经》学提出了批评,对《诗经》的本义进行了新的探索,代表著作是朱熹的《诗集传》。《诗集传》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了宋人训诂、考据的新成果,对《毛诗序》进行了批判,初步运用文学的观点对《诗经》作了新解释,第一次明确提出“风”诗是《诗经》的主体,为被后人称之为“宋学”的《诗经》研究奠定了基础。以《诗集传》为代表的宋学,解释诗义简明扼要,克服了汉学注疏的繁琐冗长,为多数学人所乐于接受,所以元、明时期的《诗经》研究,基本是宋学的继续。明后期,在音韵、校勘、名物考证诸方面有一些成绩。宋学发展到清代,其空谈心学的流弊愈加严重,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便以复古为解放,以复兴汉学来摆脱宋学义理的束缚。他们主张治学要讲求实证、经世致用,在《诗经》研究上注重考据、训诂,这与汉学的做法是一致的,并产生了以考据著称的乾嘉学派。

尽管学派之争持久而激烈,但几千年来各学派又都把《诗经》当作经,并借研究来宣扬封建礼教。真正破除对经的迷信,跳出经的圈子来对待古代这部诗歌集,是从“五四”开始的。1923年郭沫若出版的《卷耳集》,是我国第一部《诗经》现代选译本;古史辨派对《诗经》的考证辨伪,对动摇封建经学地位有一定作用;闻一多把民俗学与考据学结合起来,从文学分析的角度,来发掘《诗经》的真谛与艺术精华。这些都属“五四”以来反封建、思想解放的产物。能首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来研究《诗经》,当数郭沫若与鲁迅,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诗经》的奠基者,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研究体系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

“诗”与“经”——从一个前提条件开始

由于中华文化自身传承的固有特点,《诗经》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一部诗集的范畴。《诗经》的学术研究,从其本身来看,已经形成了一种“史”的过程,完全可以构建《诗经》学术史,形成专门的“诗经学”。另一方面,因为学术本身是一种文化生产方式,所以学术史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学术结构和学术观念的消费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诗经》作为中华重要元典之一,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对它倍加关注,《诗经》的阐释和研究在学术史上也始终处于显学的地位。

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在战国时代,《诗》已经被认为是圣人的传道之书,已经有了“经”的意义。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诗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诗”的形式表现圣人之“志”的“经典”。古人关于《诗经》的这种看法到“五四”时代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1922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①于是,《诗经》不再具有了“经”的性质,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这种认识奠定了20世纪研究《诗经》的基础,标志着《诗经》学的根本转向。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诗经》

^①赵敏俐《20世纪〈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28日。

在我们今天看来固然是普通的诗,但是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并不如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鱼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认为《诗》在当时是承担着多种功能,是有多钟应用价值的。从现有的先秦文献记载看的确如此。无论采诗还是献诗,诗在这里都被当成是为政治服务的东西,而不是用来审美。《诗》还包含着用于贵族教育的多方面内容。总之,正因为古人对于《诗》的理解与今天有着如此多的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说 20 世纪的学者们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的本来面目并不准确,这导致了《诗经》研究的狭隘化。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思考《诗经》这部书的“文学”性质了。

两千年的传统《诗经》学的主要特点可用“阐释”二字概括,“五四”前后的学者初步奠定了现代《诗经》多视角、全方位的现代研究取向。研究者分别就作家生平、作品年代、题材、语言、情节、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0 世纪初是一个典型的西学东渐时期,学术界掀起一股以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潮流,这在研究方法上,给此期的《诗经》学研究烙上了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疑古成为主导思想,极力破坏封建经学研究的影响;二是用民间歌谣作比较,并由此认识《诗经》的性质。

另一方面,《诗经》的研究也在逐步趋于冷淡。究其原因,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共识:《诗经》研究的对象——创作主体与文本,已经远离今日时空环境,成为一种历史的遗存,割断了与当下的一切利害关系,包括现场性、参与性等新闻效应。长期受主流文化支配,长期为政治服务,一旦挣脱锁链之后,反倒没有了依附对象。以往那种想挟着话语权力,利用对古代作品的再阐释,通过古典来引爆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的几率也微乎其微;那种通过对古典的释读,上书对策,成为学术暴发户的投机很难再成功了。现代学

术的游戏规则、专业训练及知识背景,都要求学者耐得住寂寞与平淡,抵挡住喧嚣和诱惑。近时期,几乎举不出可以与民国时期相抗衡的《诗经》学大家。杨树达曾批评当时的学界有“温故而不知新”和“不温故而知新”两种不良倾向。此外,《诗经》研究的历史积累过于丰厚,处于《诗经》研究高度发达之后的今天,研究《诗经》自然难逃这种尴尬处境。如何将新的研究取向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是《诗经》研究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现代《诗经》研究的阶段特征

古代《诗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理学、清代考据学。一般认为明代是《诗经》研究的一个断层,但 80 年代以来对明代《诗经》学给予了高度重视,出现了许多论著。如程俊英的《论徐光启的诗经研究》,费振刚、钱华的《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傅丽英的《明代诗经学》,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这些研究有力的反驳了“明代无《诗》学”的说法。至此《诗经》学已经形成一个自汉开始不间断的研究过程。

进入 20 世纪后,学界对《诗经》的研究更为关注,费振刚甚至认为 20 世纪的《诗经》研究史是一部学术史的缩影。高原、乔健的《〈诗经〉研究误区综述》中这样划分阶段:从“五四”到 70 年代末是一个阶段,70 年代末往后是一个阶段。“古往今来对《诗经》的研究按所使用的方法特色可分为三大阶段:‘五四’之前,微言大义,知有经而不知有诗。‘五四’到 70 年代末,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批评方法。由于大多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不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将现实主义普范化。虽恢复了《诗经》的文学地位,却终究没有看清《诗经》作为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文学性伟大在何处。70 年代末至今,新方法随着国门的打开鱼贯而

人,确已出现了一些成功的言之有物的研究成果,但多数还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有些研究只顾把玩方法之‘新’,而又使‘诗经’不成其为诗了”^①。对比而言,费振刚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站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潮的基点上的四段分法则较细致:1949年以前,以《古史辨》派的出现为界分为前后两期;1949年至“文革”之前是一个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又是一个时期。这种划分方法充分注意到了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策方针的影响作用,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无疑是适当的,但它忽视了从90年代《诗经》研究出现的新趋向。还有一种就是夏传才先生在1999年8月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20世纪〈诗经〉研究的发展》中从纵向上根据时代背景及《诗经》研究的特点将其分为六阶段:清末民初是传统《诗经》学衰退和出现革新萌芽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诗经》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模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诗经》研究从此进入现代诗经学的历史时期;30到40年代是现代《诗经》学的建设时期;新中国“前17年”是由兴旺到逐渐封冻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继往开来的新时代;自90年代中期现代诗经学进入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多元化的转型期。夏先生似乎是为了更稳妥,将《诗经》研究方法和模式多元化放在了90年代中期以后。

我们更愿意将20世纪《诗经》研究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可以看作是清代考据研究的继续。在今文研究方面,王先谦、陈乔枏等人在三家《诗》的基础上撰成《诗三家义集疏》,皮锡瑞、廖平在龚自珍、魏源的今文《诗》学研究上又有新的发展。在古文研究方面,主要有刘师培、章太炎,他们对乾嘉汉学有所发展,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方面。两派之外,王国维以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对勘的方法来整理先秦典籍,提

^①高原、乔健《〈诗经〉研究误区综述》,《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出“二重证据法”，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无形中扩大了《诗经》研究的范围，也使研究者的视域大为拓展。

第二阶段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丛书》的《古史辨》的出现，是在“五四”反传统、张扬个性精神的影响下对传统的经学研究进行彻底否定，更是对现代《诗经》学的开创。胡适提出传统考据方法的科学化，用现代观念解释传统文化。他的三篇文章《论野有死麇书》、《诗三百首“言”字解》、《谈谈诗经》就是对其理论的实践。其次是顾颉刚等人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如对徒歌与乐歌的讨论，以及对《静女》篇的讨论。还有闻一多的早期论文《诗经的性欲》，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用泛性论和潜意识来解读《诗经》的代表性作品，此外他还有为《诗经》作注解的《诗经通义》。另外还有郭沫若历史取向上的研究以及朱东润“国风非大部分出于民间”的讨论。

第三阶段，50 年代至 70 年代，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一时期文学研究处于一个运用以阶级分析法为主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思想整理传统文化的时期。此期的《诗经》学研究在系统上有所加强，但由于方法上偶或失于机械套用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一些偏差，模式化倾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一时期以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影响最大。此外还有余冠英、高亨等人的研究。

第四阶段，80 年代后《诗经》学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一是对五六十年代单一视角的突破。这首先表现在对《诗经》某些问题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上，可以袁宝泉、陈智贤的《诗经探微》为代表。该书收录 10 篇文章，前七篇是对《诗经》中一些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名篇的思想、主题的新探索，后三篇是就《诗经》研究中的某一论题的专题阐述。其总的倾向是针对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余冠英的《诗经选》的某些认识做翻案文章，核心意见是要否定“诗经民歌说”。二是传统问题的深入以及新课题的引入。如赵沛霖第一次运用文化人类学视角系统研究《诗经》，他的